

【乡村社会发展】

# 返乡创业群体的乡情文化嬗变

姜姝

(南京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京 210095)

**摘要:**在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背景的文化时空中,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着变动与适应异步、心与物发生背反、家乡变迁与群体重组的乡情文化变迁,因而寻求制度变迁的解释性理论就更加重要。本文从返乡创业群体的历史和现实实践出发,分析返乡创业群体的道德期待和俗理逻辑,探讨行动逻辑背后的时代价值和政策意义,进而揭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建设农业强国目标的乡情文化变迁逻辑,指出正是这样一种以经济利益为纽带、以家乡福利为己任、以“克里斯马”式魅力为动力的乡情文化促进了乡村社会的现代化。通过在大城市积累的经验、知识、信息和资本,在创新创业与乡村振兴政策利好下,返乡创业群体凭借独特的“亦城亦乡”的两栖性,以及“漂泊于城、归根于乡”的感悟性,在新时代的乡村社会中培植出新型的领导力和号召力。

**关键词:**返乡创业群体;乡情;文化变迁;“克里斯马”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25)02-0052-10

## 一、问题的提出

在乡村振兴战略幡然高涨及中国城市化回流加快的时代背景下,一种具有“逆向城市化”特征的新现象涌现于中国社会生态之中,一些人“飞出农门走向城市,在取得经济成就后返乡成为金凤凰已非个别现象”<sup>[1]</sup>。如今,返乡创业群体在江浙沿海地区较为活跃,在中西部农村地区也呈现逐步增长之势。国内学界对于返乡创业群体的研究,主要涉及乡村经济伦理、精英政治和道德结构等,一般认为这一群体的发展与壮大代表了农村实现经济发展、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它存在着基层政治排斥、稀释公共资源等弊病。与国内学界对于“富人治村”优劣参半的类似评价相较,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乡村政治是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詹姆斯·C.斯科特提出“道义小农说”<sup>[2]</sup>,指出在道义政治伦理影响下的乡村秩序保证了农民的基本生命权利。杜赞奇区分了传统村庄社会中赢利型经纪人和保护型经纪人的不同类型,指出传统中国的“乡绅治村”能够依靠内生的力量基本实现自治<sup>[3]</sup>。另外,学者们还围绕返乡创业群体在乡村治理实践的功能理论展开论述,更加专注于乡村治理的当代价值。有学者强调“政治功能说”<sup>[4]</sup>,认为这一群体充当着“传导器”的作用,一方面利用制度化力量将国家方针政策上传下达,另一方面充分实现公共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有学者突出“归雁经济”功能<sup>[5]</sup>,指出返乡创业群体精英可以利用业缘、契约关系等实现村庄经济整合,采用“滚雪球”的方式,将村庄结成的各种“关系的关系”向外推展出去,从而对乡土社

收稿日期:2024-01-22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城归治村’在中国基层政治中的‘新位势’研究”(2020SJA0059)

作者简介:姜姝,女,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会的经济结构进行再造。有学者重视“社会关联说”<sup>[6]</sup>,提出返乡创业群体有助于提高乡村人气,增强现代性“社会关联”,冲击原有的村庄体系,使得乡村社会传统而稳定的伦理本位受到强烈冲击。有学者依据“政治文化取向”视角<sup>[7]</sup>,认为返乡创业群体发挥了乡村社会“新旧交替”社会矛盾中的“润滑剂”作用,是网络时代先进思想和新观念的最早接触者和接受者,是“精英网络的建构者”。有学者考察了乡村社会的“半熟人社会”<sup>[8]</sup>,指出在社区史、仪式和地方关系的考察过程中需要考虑道德理性对返乡创业群体公私观念的影响,从而分析新时期村庄治理中展现的村庄社会特性。

既有研究虽为我们理解返乡创业群体提供了富有解释力的理论基础,但对于本文所涉的乡情文化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乡情背反”是笔者在《时序与家园的道德张力:流动群体中的乡情背反研究》(2015年)一文中首先提出的概念。与既往研究不同之处在于,本文属于质性研究,经验材料来源于对南京江宁特色小镇核心景区黄龙岬“城归一条街”的田野调研报告,我们力图挖掘返乡创业现象及这一新群体蕴藏的理论资源。在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背景的文化时空中,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正在出现变动与适应异步、心与物发生背反、家乡迁徙与群体重组的乡情文化变迁,因而寻求制度变迁的解释性理论就更加重要。本文从返乡创业群体的历史和现实实践出发,分析返乡创业群体的道德期待和伦理逻辑,探讨行动逻辑背后的时代价值和政策意义,进而揭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建设农业强国目标的乡情文化变迁逻辑。

## 二、流动与重构:变迁中的乡情文化

### (一) 乡情的概念界定

乡情,在《辞海》中的解释是乡里乡亲,即对存在于某一区域群体之间的关系及其文化传统、生活方式、情感价值方面的互相认同,其基础是集体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和群体生活道德的一致性。根据特纳在《情感社会学》中的定义,“共同体关系可能建立在许多不同的情感性、情绪性或共同性的基础上,在一个整体内没有情感的交流是不可想象的,情感成就了共同体家园般的感受”<sup>[9]</sup>,本人将“乡情文化”定义为对群体的文化认同,对道德生活和群体关系的情感体认和心理趋同,其以遵守相同价值观的“情感共同体”形式出现,并与传统伦理道德和现代法律政治区别开来。乡情、道德、法律都是规范乡村共同体成员日常行为的规则体系,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律以官方文本作为国家意志的标准,遵循强制力和服从性,致力于塑造懂法守法的现代公民。道德以真善美裁决是非曲直,强调道德性和伦理性,是理想行为的“君子之道”,致力于实现“善治”和社会和谐。乡情则是以既非法律又非道德的地方性伦理准则和情感认同,以乡村社会中约定俗成、情感高度一致的标准,塑造社会高度接纳、相容性高的共同体一分子。

在乡情文化的变迁中,随着社会的流动和结构的重组,每一位成员都在怀念过去关于红砖青瓦、绿柳白墙、大豆高粱的真诚的乡情,但是同时在乡村文化中愈发出现了乡愁与人心的“城乡鸿沟”,在家乡发展、群体流动和新的社会文化生活中表现为一种欲说还休、欲拒还迎的心理困境。在当代乡村社会,传统的乡情文化正在发生着嬗变:这个文化场域中较为活跃的因素有群体流动、经济纽带和城市精神,正是这三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进了返乡创业群体的发育与成长。其一,在返乡创业群体的社会流动中,存在着一种根植于心的群体利益关系,

即既能承继区域文化的优秀传统,又不囿于区域人际交往的简单继承性和排他性的现代新乡情。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熏陶正在改变着乡土中国的情感认同和社会价值观,由唯上、唯书转向了唯实,由封闭保守转向了开放进取,由不敢竞争转向了合理地追求经济利益。乡村社会的发展需要经济能人的示范引导,需要能公正且合法地化解矛盾和纠纷、统筹社会全面发展、尊重顺应村民意愿的综合型精英。其三,在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的社会进程中,每一位成员都渴望一种真诚的乡情,但是在家乡变迁、群体重组和新型社会建构过程中,人们内心又感觉到这种记忆深处的乡情正在远离,这就是变迁过程中的“乡情背反”。只有彻底消弭群体内部的心灵距离,才能够真正培育新的乡情,从而完成对乡情背反的完整超越。超越乡情背反并不是一个空洞的玄学命题,而是为了建设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保证社会和谐与发展,促进新的道德秩序建设。

## (二)乡情文化的嬗变:以“黄龙岷上茶”为个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sup>[10]</sup>。如今,返乡创业已成为乡村实践中的一种现象和趋势,而其中涌现的许多乡情文化个案已经超出了乡村振兴的一般样本,是中国式现代化更理想的乡村治理雏形。在南京西南角、苏皖交界深处,坐落着一个由茶园竹海环抱的山村——江宁黄龙岷茶文化旅游村,该村为牌坊社区第一大村,地处丘陵地带,风景秀美,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共778户2765人。其中的茶文化风情街则是黄龙岷返乡创业群体在实践历程中的创举。这里的返乡创业群体让新乡情成为黄龙岷茶文化旅游村转型发展的新品牌、创新发展的新亮点、跨越发展的新标志,进一步提升和丰富了乡情文化的内涵。

茶文化风情街是2016—2017年为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牌坊社区依托黄龙岷茶文化旅游村的自然禀赋加快启动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建设的杰作。近年来,茶文化风情街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先后创造出“乡土情结”“现代感”“仪式感”等乡情文化个案,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返乡创业浪潮中人力资本的回流,成为官方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此种乡情文化集群的成熟与发展已经超出了逆城市化的一般要求,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一个很好的发展体系样本,也是一个更理想的乡村宁静的雏形。由“黄龙岷上茶”开启的以茶品牌文化为核心、一二三产业全面开花、品牌文化带动旅游文化的“归雁经济”,注重通过文化培育来引领乡村振兴,是乡村现代化生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实现创新创业和乡村振兴政策的双重利好。黄龙岷返乡创业群体的壮大与发展是一个缩影,而由此衍生的茶文化的乡情个案,诸如茶文化餐饮、茶生态观光、茶农事体验等生态经济服务体系,更是提供了非常好的价值实现空间,能够有力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的“乡土红利”。同时,返乡创业群体能够对促进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正如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功能一样:“士绅与家乡的关联是永久性的,从而造就了他们对家乡的情感依附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感到自己有责任捍卫和增进家乡的福祉。”<sup>[11]79</sup>

返乡创业群体的“登场”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群体特征,更是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当代折射。下文介绍的茶文化风情街的三帧“城归”个案虽然萌芽和发育于不同的实践和不同的生活背景之中,但是它们有着惊人的同质性。返乡创业群体在举手投足之间所展现的乡土文化、现代气息和传统文化魅力都是“克里斯马”式的文化魅力,是城市文化的“偶像化”,拥有很强的“大拇指”魅力。这些“城归”个案都是在当前的乡村治理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后经当地政府的支持培育而成为典型,具有原创性和合理性,也许还预示着中国乡村振兴



战略发展的文化方向和潮流。在理论场域中分析它们的特点,也许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理解当代乡村振兴的方位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 (三) 乡情文化变迁的内涵特征

第一,返乡创业群体的流动性,决定了乡情内涵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这里的“半熟人社会”,是针对变动不居的城市化浪潮中乡村社会的“三留守”现象而言的。在乡村逐渐走向“空心化”的趋势下,就特别需要人们从城市回归乡村的“反向流动”。由此,在新的群体关系中人口集中度、人才资源和人气指数都亟待在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下进行重建。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除了行政推力和经济驱动,还存在一种倾向于乡村的乡情文化和情感姿态。茶文化风情街原本是黄龙岷茶文化旅游村华灯阴影处的一条背街,最初是在南部山水之外,是云集贩夫走卒、荟萃城乡热闹的地方。在建设“强富美高”新江宁的新发展时代,现代性逐渐进村,坐落在茶文化风情街上的是一栋栋西式小楼,顺着街道两边,长长一溜排过去。每间楼房都有雕花栏杆的阳台,每扇窗户都有条纹布的遮阳棚装饰。茶文化风情街好多人家自从开起了农家乐,人均年收入倍增,因此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纷纷返乡就业或创业。随着返乡创业群体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多数家庭都购买了汽车,很多家庭还去相邻的马鞍山市买了房。在这股变迁洪流中,众多社会成员两次告别了熟悉的生活环境,完成了群体生活的两次迁徙,再一次汇集到工业化、现代化和都市化的社会环境中。

第二,返乡创业群体中经济纽带的主导性,创设了乡情文化变迁的生产方式和物质基础。对现代产业技术、生活方式、新质生产力等的追求,使得乡情文化合理化并且按照一种社会化的方式进行演变。在市场化环境中,返乡创业群体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乡村回归的合理性中既为了乡里乡情的习俗和伦理,也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以经济为纽带的市场化、产业化导向,能够推动返乡创业群体积累并运用“反向输血”的经验、知识、资本与信息,实现乡村生产价值的最优化。在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图景之下,茶文化风情街业已形成茶产业、生态观光型茶园基地配套服务体系,其中富有浓厚乡村气息的农家乐生态旅游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而生态茶园、小公园与村四周山上的满眼绿色也相得益彰。乡情文化的呈现既能够突破羁绊的城市化冲动,也能够突破传统社会格局的狭小封闭,使得经济、社会、心理三个层面都受到了冲击,也刺激了更新,其中包含着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现代化变革。

第三,返乡创业群体的现代性,使得新乡情更多地受到现代化精神和城市精神的影响。新乡情需要时代精神和现代精神,这种精神是以公共生活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将个体的人格因素、生活经验和人生境界融入社会生活。现代乡村社会强调推进农业现代化走在前,主要体现在推动农业生产技术、生产规模、生产过程高质量发展,打破人力资源环境的固化和静态化,创造一种高品质的农民生活。对于茶文化风情街而言,当地请来专业的设计开发公司,精心打造美丽乡村,在不破坏周围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村进行改造升级,包括翻新旧房、重修道路、加装无线网络、修建现代化公厕、重新规划茶树种植布局等。当原生态的村居风貌结合了现代元素,黄龙岷茶文化旅游村的颜值越来越高,为当地的乡村振兴注入全新的绿色动能,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江苏特点的乡村振兴路径。同时,通过“互联网+”的新技术引入,黄龙岷的返乡创业群体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城归一条街”,以黄龙岷电子商务中心为平台,带领群众创业致富。如今,这条茶文化风情街已实现 Wi-Fi 全覆盖、24 小时智能监控和统一物业运维等现代化管理。此外,不甘落后的黄龙岷人还实践着一些先进管理理念,

如采用自助付费系统、建造太阳能路灯、驿站服务人员全部聘用大学生等。

### 三、乡情变迁的原因和动力：“克里斯马”效应

历史制度主义者曾指出,“制度变迁会在长时间的稳定状态后发生,并且天然的复杂和能动,被危机打断后则会再次进入静态平衡期”<sup>[12]</sup>。而对于由经验信念、表达符号和价值系统等构成的政治文化来说,政治文化的变迁会限定行为体所处的环境和秩序,赋予行为体以秩序和意义,并为行为体提供主观导向<sup>[13]</sup>。前人对于制度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变迁理论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也给我们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理论概念集中于“克里斯马”,以期对转型期乡情文化急剧变迁的原因机制提供解释。

“克里斯马”概念在韦伯的社会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强调一种非凡的行动形式。韦伯的观点是,在不同的社会体系,如果有某些类似“克里斯马”,也就是说,非凡的行动,那么就有可能产生历史变迁。在乡情文化中,“克里斯马”的内在逻辑是在必要时刻承担起非凡的使命。“克里斯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一种非凡的行动形式,则有可能产生文化变迁,建立在对英雄的信仰之上。这种信仰从内部出发对人进行革命化,并企图按照它自己的革命意愿,来塑造事物和制度。魅力在其最高的表现中,从根本上突破规则 and 传统,特别具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推翻其他神圣的概念”<sup>[14]</sup>。在某种程度上,“克里斯马”型领袖有点类似于费孝通说的“长老统治”,即由德高望重、处事公正、为民谋利、恩德广施的人担任首长<sup>[15]</sup>。

#### (一) 乡土情结:“当地感”的文化表达

这些乡村的“回归者”带来了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新思路和新理念,也对区域群体之间的人际关系和文化传统有着情感上的寄托。他们具备更加丰沛的“城市化冲动”,能够突破乡土社会的狭隘性和封闭性,接触并熟悉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且深受其影响。晴子大学毕业后就在茶文化风情街经营起“语晴茶餐厅”。她的茶餐厅是新装修的,是一座玻璃花房式的洋房。和她的大学同学不同,她毕业后就“死心塌地”回村了。读书生涯给她带来了文艺而又现代的气质,但她梦中萦绕的都是家乡的山水。农家乐因为深受很多从大城市来的游客的喜欢,发展得十分好。传统的农家乐因为乡土本色的经营理念而相对封闭和保守,经济行为难以对市场行为做出敏锐反应。但是在晴子这样的新生代带领下,农家乐也可以是反应敏锐、投其所好的“潜在网红”。她首先将自己的房子改造得很精致,条件跟酒店差不多,同时保留了一些具备乡村特色的日常用品、饮食方式等,将基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保存下来,形变而神在,十分有吸引力。“语晴”餐厅的特色是山鸡、野生鱼类、纯天然野菜等,还提供免费乌饭、手工馒头和秘制锅巴。

根据对农家乐餐馆的随机走访,像晴子这样的返乡创业群体,他们由城返乡,乐意在村子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不只是单纯的个人特征,也是在用实际行动和全情付出表达了对乡村生活的“眷恋”和“当地感”。这种“当地感”不仅表现为情感、感觉和心理活动,而且也是一种经济动力和物质性活动。在茶文化风情街消费,有意味的就在于“乡土”两个字,这种深刻的乡土情结牵引它的是浓浓的乡土中国磁力吸引。从隐性来看,传统中国文化基因中的“叶落归根”,是牵引每一个中国人的人生宿命;从显性来看,城市对乡村难免存在制度性排斥,乡村文化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不在场”和“失语”。我们能够在返乡创业群体中看到未被彻底“城市化”和“现代化”而依然保留着的“叶落归根”的文化意识。

## （二）绿色生活：呈现城市生活烙印的“现代感”

传统的乡土文化正在遭遇着城市化、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强烈冲击,呈现基于城市生活烙印的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性特征。农产品需求的升级换代、乡村绿水青山的环境保护、绿色农业的新质生产力等,都是新发掘的经济增长点。作为江宁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的中心景区,黄龙岷文化旅游村被串联在一条28.4公里长的生态循环线上,道路分设机动车道和骑行慢道,沿线还建起了14个各具特色的多功能主题驿站,如逢源驿站以品茶棋弈文化为主题,骑友驿站则随处可见自行车元素等。霓裳点破春茶香,屋中闲坐品春茗。每到五月中旬,适逢黄龙岷茶园里的春茶刚刚采摘结束,人们就会约上三五好友来这里喝茶赏景。来黄龙岷,沏一壶春茶,享半晌时光,还可以沿着一条青砖铺就的茶文化风情街,欣赏别具一格的江南民居,逛逛热闹的农家集市,领略原汁原味的江南农家生活。

经济发展和生活富裕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保障,而“城归”带来的现代元素和历史元素可以被充分利用,以便于开发农业资源。在一些学者看来,“城归”精英具有更多的“城市化冲动”,走出了封闭的乡土社会,接触并熟悉了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且深受其影响<sup>[16]</sup>。比如,漫步在茶文化风情街上,人们总是容易被那家“梦想茶社”和它的主人所吸引。门口的介绍展板上镌刻着几个艺术花体字——“经理:久久”,久久的“梦想茶社”别具一格。在美学设计空间里,久久认为简洁才是最本质的,具有直击人心的力量。这里的装修设计得到了黄龙岷社区资源的支持,空间内的陈设选用的都是简欧风格,而非那些花哨的材料,体现自然、宁静、素雅。为了满足城里人的休闲需求,“梦想茶社”将农业生产、科技应用、艺术加工和游客参加农事活动融为一体,游客可以领略在其他风景名胜地欣赏不到的大自然情趣。“梦想茶社”不仅可以泡茶饮茶,而且可以根据地方特色和时节变化设置不同的农事体验活动,是集可看、可吃、可娱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休闲农业典范。久久感慨:“现在做的咖啡茶饮文化行业,还是以实体空间运营为主的文化行业,在‘双创’的黄金时代,是顺势而为的举动。想做这件事,是源自内心真正的热爱与坚持。没有信念的驱动,没有办法坚持下去,这是个延时满足的事业,要有利他精神。”

## （三）传统仪式：现代乡情文化的“在场宣示”

对冲单一的城市文化与现代文化,返乡创业群体结合传统文化形成独特的乡愁和乡村秩序。乡村生活场域的幸福与否,不仅影响着乡村社会居民的生活品质,还会影响地方经济转型的可能途径,并且进一步吸引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返乡创业群体回归乡村不仅是出于经济动机,而且是基于情感上的“家乡情结”,所以乡村从来都不单是利益连接的场所。在乡情文化中,仪式性的活动在乡村事务中占有一席之地。一般认为,仪式是指按一定的文化传统将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集中起来的安排或程序<sup>[17]</sup>。仪式的特性包含了共同参与、象征性、程式化等,仪式的最高境界恰恰是为了建构并维系一种有秩序、有意义、能够支配和容纳新群体的“天理人伦”。

2016年从美术院校毕业后,大学生修子凭借独到的创意、成熟的创业想法、丰富的创业内容,在“大学生创业计划项目”的扶持下,她的陶器铺项目正式落地。她打造了一个具有茶道、花道、香道特色的创意小铺。陶器铺里陈列的每一个物件都是质朴、率真、简单的。在日常工作中,她带着对陶瓷器皿的热爱,凭借精湛的绳结技艺和纯熟的泡茶手法,把陶器铺打理得井井有条,将陶器和绳结有机融合在一起,使得陶器显得愈发匠心独具。许多游客进入陶器铺都会沉浸在这一极具特色的小铺中,欣赏一出茶艺表演,品鉴一啜黄龙岷好茶,卸下身心



的疲惫,享受一场心灵的放松和仪式感。陶艺是个很开放的艺术形式,烧制只是手段,既能做成实用器皿,也可以满足艺术创作。陶艺家的视角与传统陶瓷匠人是不一样的,不管是釉色、造型,还是烧成方式,不拘泥于传统,发展方向非常多元化,人们可以通过陶瓷材料这一媒介,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感情。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修子已经成功掌握了多种传统陶艺技法。她表示,以后会增加现场体验活动,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门传统的艺术。在美丽的金陵城郊修身养性,有大片的活水湖,山水相通、曲径通幽。仪式与表演、古典与现代、清新气质和成熟韵味、东方艺术和传统文化在优雅的茶道表演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光与影的交互错落。一方面,这一仪式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新形式的文化审美和情感交流;另一方面,这种弥补乡土文化“不在场”的宣示,是外来者融入当地,成为“土著”社会关系在场的需要。

#### 四、返乡创业群体以现代性身份回归新乡情

返乡创业群体作为“克里斯马”式的领军人物,重新聚集了“空心化”乡村的人气,一扫转型期乡村“三留守”、老龄化的衰败景象,提升了乡村振兴的信心与干劲。他们很多是青年大学生,乐观向上,拥有拼劲和闯劲,呈现优秀的领导力和号召力,主要体现在:第一,经济发展的反向输血能力。他们通过在大城市积累的经验、知识、信息和资本,在乡村最需要的生产要素方面独领风骚。第二,文化建设的现代生活意识。变动不居的时代长河催生了返乡者现代化的文化认同,赋予了返乡创业群体更加丰沛的“城市化冲动”,这不仅意味着延伸与发展乡村产业链的现代生产方式,也意味着新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变革,还意味着一种将现代精神赋能传统乡村的有机力量。第三,乡村建设的深刻社会意识。返乡创业群体的社会意识主要表现在独特的“亦城亦乡”的两栖性,以及“漂泊于城、归根于乡”的感悟性,所以能够在日渐“空心化”的乡村中培植出新型的领导力和号召力。新时代的返乡创业群体以一种现代性的身份,引领着人们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回归人与生态环境社会和谐乡情文化。然而,在现实环境中,他们也觉得压力重重,甚至因为乡情变迁的“水土不服”而感到漂泊和迷茫,由此出现返乡创业群体的“社会孤立”。这种孤立既表现为在乡村社会中他们脱离了原来土生土长的“土著”社会关系,也表现为在新群体中难以确认身份和地位的游离的社会关系。

##### (一) 发挥“克里斯马”人物的领军效应,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增长点

在乡情文化中,韦伯的“克里斯马”概念已经发生变化,泛指那些具有人格魅力的领袖人物,自塑起乡村新精英的角色,凝聚乡邻,在乡村文化生活中起到关键作用<sup>[18]</sup>。从某种意义上说,“克里斯马”也代表了新质生产力中更高素质的劳动者。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这就需要鼓励劳动者大胆创业,加强对返乡创业群体的思想文化、技术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培训和指导,通过政策引导、创业资金扶持和后援技术支持,将其配置成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的中坚力量,提高农业集约化、商品化、专业化和基地化水平,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正如有学者指出,这一“城归”精英群体有助于凝聚民心,增强现代性社会关联<sup>[19]</sup>。同时,返乡创业群体队伍的壮大也契合了江苏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需求。当前,城乡土地等要素流动仍有障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仍不平衡,农村改革深度和集成应用仍不高,尤其是缺少农业企业家、乡村职业经理人和新型农村工人,这些人才的缺

口造成了返乡创业群体“水土不服”的种种困境。农业领域发展具有其自身的特性,投资大、见效慢、周期长,所以还需要一批能有效动员、引导返乡创业群体、科学管理的乡村经理人,从而确保项目运营的顺利发展。因此,“克里斯马”型人才在经济发展中非常关键。

## (二)化“水土不服”为“落地生根”,打造独特乡愁的“情感共同体”

“水土不服”来自“以邻为师”的例子。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乡情变迁的方案来自何处。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很多变迁方案来自他者现成的“模板”。在外部示范效应中,要有选择性地挑选成功样本作为效仿对象,才能带来波浪式的变迁潮。而在返乡创业群体的现实实践中,许多扶持政策遭遇“玻璃门”现象,真正落地生根、有所裨益的不多。村庄文化难以将“外来者”和“本土派”融为一体,返乡创业群体之间也难以共享共同的生产文化和信仰文化。齐格蒙特·鲍曼指出,现代化世界的流动无处不在,我们都置身于其中,成为日益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的一员<sup>[20]</sup>。与城市相比,乡村老龄化人口比例更高,纯粹市场导向的模式便显得不合时宜。重新建立一种以社会和道德为基础的乡村文化发展模式,是提高乡村重建能力的重要途径。返乡创业群体在其中也会是振兴乡村的一支重要力量,既能够带来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新思路和新理念,也会对区域群体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传统文化有着情感上的建设。通过对冲单一的城市文化、现代文化而形成独特的乡愁和乡村秩序,发展成社会和文化关联度高的村庄,打破“半熟人社会”之间的距离和隔膜,可以重建城乡共同体。在与返乡创业群体的深度访谈中,乡愁与乡情就像一种隐形的“黏合剂”,在情感的隐秘深处吸引着各种各样的“异乡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重视将乡情的内涵纳入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要以现代精神、公共生活和共同利益为基础捍卫和遵守公德、规则和法度,将个体的人格因素、生活经验和人生境界融入其中,实现从传统乡情向现代新乡情的超越与升华。文化认同是社会融入的最高等级,曾经的城市生活经历不是障碍,而是一种补充,能够在变动不居的时代克服“水土不服”,使得乡村区域的“外来者”不会成为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异乡者”。

返乡创业群体对乡情文化的融入,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流动,而是新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引入和嵌入。事实上,乡村的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硬实力的现代化,也包含着人的回归,包含着乡土中国的生活方式的变革和精神面貌的唤醒。传统乡土文化以安土重迁为核心,具有长期性、地域性和封闭性,而现代城市文化则是基于城市生活烙印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城市文化打破了乡土文化的封闭性,这种变革其实也是生活方式的革命。返乡创业群体以宏观方式引领文化建设,以中观方式改造社区建设,以微观方式重构组织建设。他们的回归正是一种将现代精神带入传统社会生活的有机力量,表现为一种领导乡村社会的生活品位和价值体系的能力。

## 五、总结

新时代的黄龙岷乡情文化历经了一个市场化、传统化和后现代化的过程。在国家主导的乡村振兴战略下讨论乡村乡情文化的变迁,建构“情感共同体”,打造既能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不囿于区域人情的现代新乡情。韦伯的研究是有益的,他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对变迁的原因和动力进行了分析,其中的理论资源对于文化变迁中的主观因素大有裨益。这样,“克里斯马”就构成了理解乡情文化变迁现象的关键词。笔者认为,如何结合国家战略,维护、巩固甚至重塑中国基层的乡情文化,是国家与社会不得不高度重视并慎重考虑的一项重大而持久的



工程。

## 参考文献:

- [1] 厉以宁.“城归”将成为新的人口红利[J].理论与当代,2017(2):23-28.
- [2] 詹姆斯·C. 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程立显,刘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32.
- [3]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62.
- [4] 谢安民.精英转型与乡村双轨政治重构[J].学术界,2023(2):91-102.
- [5] 项辉,周俊麟.乡村精英格局的历史演变及现状——“土地制度—国家控制力”因素之分析[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1(5):90-94.
- [6] 王威海.摆脱现代社会的两难困境[M].沈阳:江海出版社,2018:52.
- [7] 孔德永.认同与社会稳定.社会主义研究[J].2012(7):42-50.
- [8] 赵爱庆,孙建军,赵佳维.超越乡村精英治理模式的政治抉择[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8(1):54-59.
- [9] 乔纳森·特纳.情感社会学[M].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81.
- [10]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3.
- [11]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范忠信,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2.
- [12] Stionomo S, Thelen K, Longstretheds F. Structuring Politics 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J]. Comparative Analysis,2010(2):9-15.
- [13] G Almond.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J].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956(18):396-402.
- [14]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7.
- [15]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6.
- [16] 林修果,谢秋运.“城归”精英与村庄政治[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23-28.
- [17] 陈国强.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37.
- [18] 胡鹏辉,高继波.新乡贤: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20-29.
- [19] 亨廷顿.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M]//尼考劳斯·扎哈里亚迪斯.比较政治学:理论、案例与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3.
- [20]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M].徐朝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72.

(责任编辑:李凌)

##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Returning Home Entrepreneurship Groups

JIANG Shu

**Abstract:** In the cultural time and space characterized by China's uniqu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in China is undergoing significant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cluding asynchronous changes and adaptation, the conflict between perception and reality, the migration of

hometown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communities. Consequently, it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seek an explanatory theory for these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is paper aims to delve into the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analyzes the moral expectations and ethical logic, as well as the policy significance, behind the action logic of the returning home entrepreneurial group. It seeks to uncover the logic by which Hometown Culture contributes to the goal of building an agricultural powerhouse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t suggests that it is this Hometown Culture, bound by economic interests, committed to the welfare of the hometown, and motivated by the allure of a Christian style ethic, that fosters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society. Through the experience, knowledge, inform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ed in metropolitan areas, and supported by favorable policies such a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turning home entrepreneurial group has nurtured a new brand of leadership and charisma within the rural society of the new era. This is attributed to their unique dual identity of being “both urban and rural” and their perspective of “drifting in the city and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Keywords:** Returning Home Entrepreneurial Groups; Hometown Cultur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Charisma”